《摆脱贫困》的治国要略与传承

□ 冉　昊

《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最早出版于1992年，它是习近平1988年到1990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29篇重要讲话和文章的合集。

其时他才35岁，作为年轻的地委书记，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理应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派，但这本书读下来，却是如饮甘饴的风格，而涓涓细流中仿佛暗藏着一股力量，使泉石有声，铿铿然而余音无穷。这股力量究竟源于何处，能够如此深厚而弥坚？

平实而有根据和方法

文笔实，是这本书鲜明的特点。虽然本书的核心是讲宁德作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摆脱贫穷，但读起来没有空而无物的大道理，或是高高在上般颐指气使，只有简单平实的大实话，全然感受不到书的作者是主政一方、年轻有为的领导，而更像是一位语重心长的大哥哥坐在身边，与我们谈心。如谈到秘书工作时习近平说要努力做到“五不”，即“不自恃、不自负、不自诩、不自卑和不自以为是”，朗朗上口却切中要害。

习近平善用比喻，他用“滴水穿石”的故事形象比喻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并由此联系到为官一方不应当急功近利，“不需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依据牢，是本书的又一亮点。别看当时的习近平年纪轻轻，写文章却是有理有据。一面是用数据做支撑。当谈到宁德地区的畲族贫困人口问题时，畲族贫困户多少、占比多少、脱贫率多少，作者对这些数字了如指掌，看得出他早已将这些世情民情内化于心，而不是“赶鸭子”般地仓促罗列到文章上去的。

另一面是有历史沉淀和理论深度。这本书既有历史典故，又有对经典文献恰到好处的引证。讲做县官的重要性，用海刚峰“官之至难者，令也”的名言做旁证；谈做官的动机，却举出李白、杜甫官不过五品，说明做事留名与官阶大小并无必然联系等。在分析“为官之德”时，习近平引用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原始氏族社会中酋长的道德传承性的论证，指出道德的力量之于人性的普遍价值，由此引申出对共产党领导干部道德水平要严格要求。

方法好，体现了这本书的实际功用。这个“好方法”并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是习近平当年做地委书记时的工作方法——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调查研究。习近平认为这是解决贫困地区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也是提高领导威信的必要条件——因为领导的威信“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只有全心全意、尽心竭力、坚持不懈为人民办事，才能逐步地树立起来”。

为此，习近平甫一上任，就花一个月跑遍宁德地区九个县，针对闽东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交杂的现实状况，提出了“弱鸟如何先飞”的战略发展思路。他密切联系群众和调查研究的这个法宝，与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以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群众工作法则一脉相承。他将这种务实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一直坚持下来，才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摆脱贫困”的理念传承

这本书虽成于将近30年前，但并不因时间久远而过时，也不会因为它只是针对闽东这样一个相对偏远落后的局部地区而丧失其普遍性意义，原因在于本书所蕴含的巨大价值——“脱贫”理念的传承与对现实扶贫的借鉴，并不会因年代的星移而衰减。

第一是“精准扶贫”的方略，也就是“扶持谁”的问题。早在1988年闽东九县调查中，习近平就提出了“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即每个村都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扶贫的针对性——当前“精准扶贫”针对每家每户的不同情况“建档立卡”，从而实现扶贫的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习近平当年在宁德地区搞脱贫的总体思路的延伸。

第二是通过加强基层党建来扶贫的思路，也就是“谁来扶”的问题。当年，习近平敏锐地洞察到，贫困地区致富难的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党组织凝聚力不强了，更有甚者认为“包产到了户，不要党支部”——这与党的十八大以前部分基层党组织普遍出现宽松软的局面何其相似。在习近平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下，宁德地区逐步重新树立了“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党支部”的理念，使农村党组织成为“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正如当年的宁德实践，现在全国范围内共选派了77.5万名驻村干部和19.5万名第一书记，通过驻村帮扶，实现对贫困村驻村帮扶的全覆盖，让驻村扶贫“下得去、待得住和真扶贫”。

第三是扶贫模式的创新，也就是“怎么扶”的问题。当年习近平对“闽东经济发展的六对关系”做过深入分析，颇有点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格局。其中，关于正确处理开放与扶贫的关系，习近平当时就已经认识到用“开放”带动扶贫的重要功能，通过开发资源和开放市场，实现畲族地区脱贫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这与当前“精准扶贫”过程中，通过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实现从“别人给钱”到“自己赚钱”的转变，其内在思路是完全一致的。现在“劳务输出脱贫”的创新模式，即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市民化来推动贫困户脱贫，也可追溯到当年习近平对宁德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脱贫的实践。

记得小时候，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们冬天跟着牛尾巴走，眼见牛拉下一泡屎，便纷纷鱼跃上去——用粪便的余温来采暖。几十年过去了，如是场景，早已一去不复返——即使是在现在最贫困的地方。5年来，全国有6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这意味着每年有1200多万人口脱贫、每个月有100万中国人脱贫。虽然在扶贫脱贫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个成就与别的国家比起来，恐怕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从传承“摆脱贫困”治国要略的意义上说，习近平的《摆脱贫困》虽是旧作，却不啻为一部新著矣。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乡村的色彩

□ 邱华栋

提及乡村，便绕不开故事。

1924年春夏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其中一站是山西，受到了阎锡山的接待。席间，泰戈尔问阎，他为什么见不到阎所说的中国的“中”道文化。

阎锡山答，您若想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儿。阎锡山认为，中国文化的真谛是“中”，何谓中？公、平、均、无私，共利共生，合作而非竞争，即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人之间的和谐。

乡村往往意味着自然。

坦荡如砥的土地、生机葱绿的农田、悠闲的成群的牛羊、开着收割机农作的人们；阿尔卑斯山下的瑞士小屋，法国的波尔多庄园，美国德克萨斯的农场、爱荷华的玉米地……乡村，总是让人涌起一种向往，令人不经意间萌生诗意，产生“我要回农村”的些许冲动。

之所以生此感慨，是由于作家何南的新作。

去年我曾读过何南的《学校保卫战》，对其关注乡村的视角产生了较深印象；今年再读其《村庄保卫战》，有些话便不得不说了。

《学校保卫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所乡村学校要被撤并，有关部门已做出决定，按说已“覆水难收”。偏偏学校的几个孩子过不了心里的这个坎，他们自发地站出来，得到校长和少数家长支持与配合后，竟然保住了这所学校。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新鲜，乡村学校撤并也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但掩卷而思，何南的本意并非只到保住一所学校而止。他讲的应该是一所乡村学校，对于一个乡村孩子的成长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村庄有无学校，看似非黑即白，但黑白之择，兹事体大。

如果说，《学校保卫战》的视角让人眼前一亮，那么，何南今年新推出的《村庄保卫战》则令人一惊。

人类的童年期，有群居地，没有村庄。当人渐渐增多、当亲情变成空气一样的存在、当土地渐渐变得肥沃、当凝聚力渐渐变得强大、当希望在人们心中蒸腾……人们的聚居地，才成为村庄。村庄的形成，不唯是时间的杰作，更是心的凝聚、文化的诞生。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村庄、远离村庄，外出打工，不论为了什么，都从某种程度上冷落了乡村。当村庄成为逢年过节才回的地方，当村庄不再是根据地和加油站，只是短暂的落脚点甚至无奈的选择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发展巨大成果的一部分已经被忽视或否定了。

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建设，应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面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何南保卫村庄的方式是用自己的笔。他在《村庄保卫战》中这样描写：“西岭村的雪天来了！西岭寺学校后面的宫殿顶上、李氏祠堂前面的松柏上、村东口的老槐树上、村西的石桥上，一夜之间被一双神奇的手精心洒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白色，阳光初绽的一刹那，弯下身子仔细看去，白色的边上还有轻轻薄薄的一晕金黄，让你不忍下脚。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写过一首《西江月》的词，其中有这样两句：‘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就写出了爱雪惜雪人的心情。麦田由绿色变成银色，站在田塍边静静地听去，你会听到雪呵护下的麦苗发出的细弱笑声呢。”

从城市的高楼上看去，看到的应该是青山绿水、富足和谐的乡村，是和乐的、纯朴自然的农民，这是真正的金山银山。这便是乡村的色彩、农民的色彩，也是中国人心中的色彩。

（作者为著名作家、评论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读书旧事

□ 吴　旻

朋友来看我，带一枚小小的自制印章送我，喜得我满院子转悠，寻找着合适的物件，想印上我的名字。爱人从书架抽出本《文化苦旅》，翻开首页递给我：“喏，盖上你的大名，以后这本书我再也不敢碰了。”屋子里的人都笑了，我也笑了，接过来盖上大印送回书架——大家都知道我的毛病，自己的书从不外借，出门看上别人的书就死皮赖脸地骗到手。这么自私的人，居然还能有朋友，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呢。

小的时候没有书读。认熟了几个字，便对一切有字的东西感兴趣。每次开学课本发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语文书从头翻到尾，把能读的故事、诗句看个遍。若是得知哪位同学有本小人书，便会狗皮膏药似地粘上去，代写作业、拎书包、帮忙打扫卫生，总之，只要能把书拿到手，啥事都好商量。在那课外读物极度贫乏的少年时光里，因为别人的书在我手中停留的时间有限，我居然练就了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最厉害的是有一次表哥不知从哪儿借来一本《快乐王子》，也许是因为我总是烦他，也许是因为我俩读书速度不一样，他不愿意将书转借于我，甚至不允许我与他并排一起看书。于是他贴着墙角蹲下，书摊在他脚前的地面上，两只脚分别压着书角，两只胳膊却伸展在空中阻止我靠近。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定如那见腥的猫儿，左右近身无效后只能站在他对面，与他头顶着头看着同一本书——那些字句他正着看，我倒着读，居然还能跟得上他的进度，一起把那本书看完了。直到现在，这都是让我得意的一件事。

高中时学校建了图书馆。至今记得那个中午，饥肠辘辘的我正奔向食堂，看见一辆卡车停在医务室旁的空房子前，几位老师正把一提一提的新书往室内送。我的班主任也在其中，见我们便远远地大叫：“来几个人帮忙卸书！”我撒丫子奔过去。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新书，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第一次看见数十排比人高的书架上排满了书！第一次体会到原来书中的油墨味会聚在一起，浓到把人熏醉！我第一时间办了借阅证，以平均每天3本的速度穿梭于教室、图书馆、宿舍，直到在物理课堂上被老师从物理课本封皮下抽出了《笑傲江湖》！

一直很感谢那位教物理的赵老师，虽然我从来没有当面向她表达过谢意。下课后她还书给我，并没有过多批评，但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清楚：“如果你只是囫囵吞枣贪大求多地读书，只是醉心于书中光怪陆离的情节，那么你不如不读！”

在那天落日的余晖里，那位总是慢条斯理、每日依照书本做着实验的老太太身上，我第一次体会出了知识的涵养与光辉，发现师者的大气美好与我的浅薄无知。我开始管束自己，为读书定下了规矩：以学业为重，闲时读书先分类，不求书目多，好书读多遍。事实证明，赵老师的当头棒喝成了我读书生涯的方向标，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有效地从书本中汲取到了更多的智慧。

读书让我增智、明理，让我身处斗室亦可与古人对话、去未来遨游，享受灵魂精神之自由；读书令我养心、自律，品味世事百态，以恬然之态静守人生苦乐，笑看岁月变迁。

我与书

《难忘的中国留学故事》在日出版

2017年12月中旬，刊登了45篇获奖文章的《难忘的中国留学故事》在日本各大书店上架。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在中国驻日使馆支持下，日本侨报社今年4月举办首届“难忘的中国留学故事”征文活动。45天里收到93篇文章，作者既有退休老人，也有还在中国学习的年轻学子，有外交官、大学教授还有企业高管，文章记录了因留学与中国的相遇结缘、结识的朋友与感受到的中国魅力，有的还对中日关系发展提出了积极建议。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为该书作序。日本侨报社总编辑段跃中说，希望通过日本留华毕业生的文字，让更多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魅力。

（刘军国）

白瓷时代的“一带一路”

□ 禾　刀

在西方接触中国瓷器方面，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不能不提。

首当其冲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291年，马可·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威尼斯。8年后，马氏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了在福建的制瓷见闻，“刺桐城（泉州）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这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瓷器。可以说，马可·波罗掀起欧洲人对瓷器的狂热，也揭开了欧洲人四百年摸索瓷器制作工艺的漫长历史。

另一起当然要数“克拉克瓷”。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中国青花瓷，因不知产地，被命名为“克拉克瓷”。这些瓷器在欧洲拍卖引起轰动。

通过陆路抵达元朝的马可·波罗，穿行的正是后人所称的丝绸之路。而装载大量瓷器的克拉克号更可能走的是海路。某种意义上，中国瓷传入欧洲路线与今天的“一带一路”走向不谋而合。

作为白瓷的忠实拥趸，英国陶瓷艺术家埃德蒙·德瓦尔历时18个月，走访了中国景德镇、德国德累斯顿、英国普利茅斯三大世界著名瓷都，在《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贯穿中西视角，结合旅游札记、回忆录与历史讲述，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

瓷器在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便已出现。及至汉唐，工艺已相当成熟。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睡后茶兴忆杨同州》一诗中曾吟道：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

马可·波罗将瓷器带至欧洲后，中国瓷器迅速风靡欧洲大陆。如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瓷杯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1607年，法国皇太子用中国的瓷碗喝汤，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法王路易十四为了讨好他的宠姬旁帕多夫人，专门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托里阿诺瓷器宫，用来陈列中国青花瓷；德国奥古斯都大帝成立科学院，图谋制瓷之道。最疯狂的要数萨克森王国的国王，居然不惜用四个配备精良的皇家卫队到普鲁士王国换取12个中国青花瓷瓶；17世纪贵格教徒被反复告知，尽量不要在桌上摆放精瓷茶具，因为它们更多是为了好看，而不是实际使用。在“克拉克瓷”发现后的百年间，至少有6000万件中国瓷器运往欧洲。

中国瓷在欧洲被曾称为“白金”。虽然欧洲人梦想像中国人那样制瓷，但直到1708年1月15日，长期被奥古斯都关在城堡地下室里的德国炼金师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才研制出欧洲史上第一个白色硬质瓷。

另一位为欧洲制瓷作出“卓越贡献”的当数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1712年，在景德镇“潜伏”7年之久的殷弘绪向欧洲耶稣会奥日神父寄了一封万言书，不是汇报“本职”工作，而是详细披露了制瓷工艺。1716年，发表在《科学》杂志。发现对欧洲制瓷没有太大帮助，殷弘绪10年后再接再厉又发回一封万言信，这次谈得更细更深更全，简直就是一本制瓷百科全书。

在超级间谍殷弘绪矢志不渝的努力下，中国瓷在欧洲终于生出了孪生兄弟。1793年，当英国大臣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来华时，居然把韦奇伍德瓷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坐井观天的乾隆对此自然不屑一顾，被其一同锁入库房的还有上千件打着工业革命烙印的最新成果。

不无讽刺的是，殷弘绪偷走了中国制瓷工艺，德瓦尔却以“这位勤学好问的神父”称赞，并狡辩“他写信描述瓷器的制作过程，但真正的主题是同情”。在殷弘绪一再向欧洲披露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内幕时，欧洲知识产权保护已渐成气候：英国在1623年颁布了《垄断权条例》、1709年制定了《安娜女王法令》，法国也于1857年颁布实施了《关于以使用原则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识和商标的法律》。波特格尔瓷诞生后，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知识产权保护。

无独有偶，曾令西方人倾倒的中国茶叶，也因一个叫罗伯特·福钧的英国人盗走了树种和制作工艺而一落千丈。在极度看重知识产权保护的欧洲，每每提及盗取中国瓷和制茶等技术时，流露的居然是一种恩赐之情，而非对历史的愧疚。

受制于交通阻隔，当年中欧间不可能真正做到时通有无，夸大想象并不奇怪。极为郁闷的当是，白瓷时代的“一带一路”竟反倒成为西方列强后来侵略中国的重要通道。古今对照不难发现，今天的“一带一路”之所以一经推出便拥者云集，最根本的原因当在于四个字：“互利共赢”。